

文津阁《四库全书》入藏110周年

乾隆时期档案所见文津阁藏《四库全书》入度与复校始末

□ 王俊双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乾隆三十七年（1772），清高宗颁诏天下征求书籍，乾隆三十八年二月正式开始《四库全书》的修纂工作^①，并于次年决定仿照宁波范氏天一阁形制营建藏书楼以备将来庋藏这部巨典，最终形成了由文渊、文源、文津、文溯北四阁及文汇、文宗、文澜南三阁组成的四库七阁藏书规模。其中，位于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建成较早，为其他诸阁的修建提供了经验，而清高宗几乎每年五月下旬至九月驻蹕避暑山庄这一习惯，也令藏于文津阁的这一部《四库全书》常得御览，不仅吟咏题诗的数量为七阁之最^②，还在《四库全书》复校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借助乾隆时期清宫档案等相关文献，深入文津阁营建、文津阁藏《四库全书》入度及复校工作的种种历史细节，以进一步增进对《四库全书》修纂及文津阁《四库全书》相关问题的理解。

一、“文津实先构”：文津阁营建及示范作用

随着书籍征集与《四库全书》编纂工作的开展，有感于浙江宁波府范懋柱家藏书丰富、流传经久，乾隆三十九年六月，正驻蹕避暑山庄的乾隆皇帝下旨令杭州织造寅著前往询察范氏天一阁的房屋书架造作之法^③，以作为《四库全书》藏书楼营建的参考。此后不久，乾隆皇帝即于避暑山庄内为建造文津阁择定基址、确立布局，并于此年秋天动工。乾隆四十年夏，文津阁落成，五月，例行巡幸至此的乾隆皇帝作《题文津阁》，其诗题自注记录了文津阁营建开始和完工的时间：“庋《四库全书》之阁凡三，文渊、文源而外，山庄之文津，其权輿也。阁始于乾隆甲午秋月，越次年乙未夏月葺功。适驻蹕于此，赋诗落成。”^④

^①关于《四库全书》编纂起始时间，历来说法不一，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认为应以四库全书馆开馆时间为纂修工作正式开始的时间，并在辩证诸家观点的基础上将时间确定为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今从其说。（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5—32页）

^②章采烈：《论乾隆御制〈四库全书〉诗的史料价值》，《故宫博物院院刊》，1995年第1期，第21—27页。

^③《谕著杭州织造寅著亲往宁波询察天一阁房间书架具样呈览》，乾隆三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12页。

^④爱新觉罗·弘历撰：《题文津阁》，《御制诗四集》卷三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三二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87—288页。

避暑山庄内由东北自西南引武烈河入园造景，于松云峡、梨树峡谷口汇为湖泊后分两道支流向南而去，两道之中形成一座岛屿，建有玉琴轩、宁静斋、千尺雪、曲水荷香等，山水错落，清幽雅致。乾隆四十年夏，文津阁即于此岛北端建成，三面环水，是一组包括藏书楼在内的完整建筑群落^①(图1)。据此年《热河园内新建文津阁工程奏效黄册》记载：

热河园内新建文津阁一座，六间，通面阔七丈六尺，进深四丈六寸。碑亭一座，四面各显三间，通见方一丈八尺，内里青白石碑一统，通高一丈六尺六寸。宫门三间。四方亭一座。仙台一座。青白石碣一座。叠落花台一座。阁前月台一座，上安铜海马石座二座。值房三间。前抱厦三间。墙垣，凑长六十四丈六尺四寸。圆光门一座。开挖水泡，凑长二十三丈四尺。进水泄水明暗沟，凑长四十一丈四尺五寸。泄水闸二座。板凳桥一座。大料石泊岸，凑长三丈三尺一寸。以及海墁、甬路、散水、油画、裱糊、内里装修、书格、竹帘、雨搭、拉运木植车脚、栽种树株等。^②

建筑工程颇具规模，所需木石建筑物料、工匠役夫劳务支出、涂饰装潢的耗费等共计开支银七万九千八十九两六钱九分一厘^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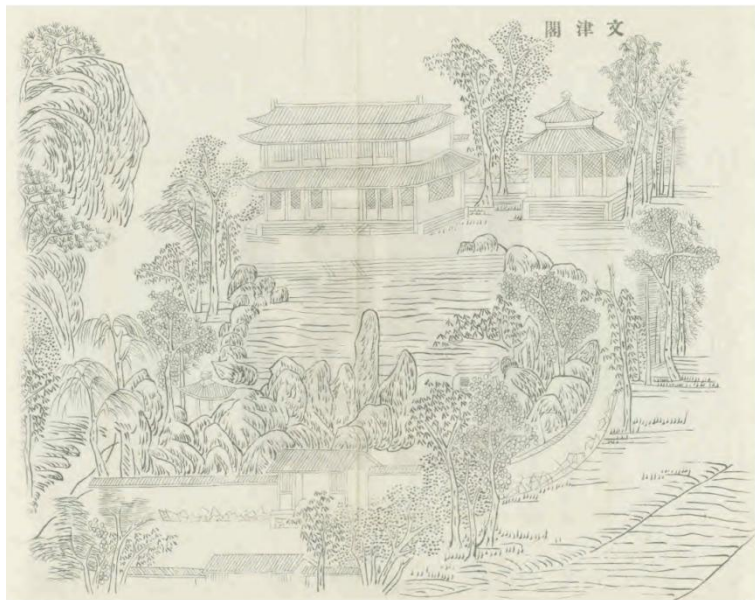


图1 《钦定热河志》卷四十一，民国二十三年（1934）辽海书社铅印本

在四库七阁中，营建北四阁的规划要远早于南三阁，而北四阁中又以文渊、文源、文津三阁营建最先。乾隆三十九年营建之始，乾隆皇帝即分别撰写了《文渊阁记》《文源阁记》《文津阁记》，在阁记中，乾隆皇帝阐明国家承平、修典重文之意以及“书之成，虽尚需时

^①杨文艳：《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研究》，天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年，第50—55页。

^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承德市文物局合编：《清宫热河档案》，第三册，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第468页。

^③据小飞：《文津阁的肇建与修缮——兼论〈四库全书〉的庋藏与移置》，《文博》，2017年第3期，第72—78页。此文据乾隆四十年《热河园内新建文津阁工程奏效黄册》详细梳理了文津阁营建使用的物料、银两等情况，可供参考。

日，而贮书之所，则不可不宿构”^①的需求，同时明确《四库全书》纂成后各缮四分，“一以贮紫禁之文渊阁，一以贮盛京兴王之地，一以贮御园之文源阁，一以贮避暑山庄”^②。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乾隆皇帝下旨制作文渊阁、文源阁、文津阁玉宝三方：“交苏州将宝按本文刻阳文字，其册页按本文刻阴文字，俱要往深里刻，做其文津阁宝并宝册页，先行刻做送来”，又令将御笔阁记手卷进行装潢裱褙，乾隆四十年四月，根据谕旨，文津阁宝首先制成（图2），以供乾隆皇帝确认其样式是否符合要求，文源阁宝、文渊阁宝亦于此年九月、十二月分别呈进^③。或是由于兴建之初乾隆皇帝正驻蹕避暑山庄，文津阁得以率先开工，文源阁的建造则紧随其后，且均竣工于乾隆四十年夏。文渊阁于乾隆四十年二月始建，于乾隆四十一年春竣工^④。而文溯阁的建造则晚至乾隆四十六年左右^⑤，至乾隆四十七年方完工。^⑥



图2 文津阁《四库全书》本《伤寒总病论》卷端

^①弘历撰：《文渊阁记》，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721页。

^②弘历撰：《文津阁记》，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723页。

^③《乾隆三十九年行文造办处承做热河活计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承德市文物局合编：《清宫热河档案》，第三册，第314—315页。

^④刘欣佳：《北京故宫文渊阁大木作营造技艺研究》，天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年，第13—17页。

^⑤关于文溯阁营建的准确时间，学界历来说法颇多，廖勇《（盛京）文溯阁的建成时间考》总结诸论并加以考证，认为文溯阁动工时间为乾隆四十六年初，竣工于乾隆四十七年正月，今从此说。（廖勇：《（盛京）文溯阁的建成时间考》，《邢台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第95—96页）

^⑥乾隆五十年御制诗《文津阁咏古树》“四阁度书构九岁”自注称：“自甲午分建四阁贮《四库全书》，御园之文源阁、山庄之文津阁均以甲午经始乙未藏工，大内之文渊阁始于乙未，成于丙申，至盛京之文溯阁，以壬寅工竣计，自甲午至壬寅，凡九年而四阁俱成。”（爱新觉罗·弘历撰：《御制诗五集》卷十八，《清代诗文集汇编》，第三二七册，第503页）

文津阁不仅是七阁中较先落成的一座藏书楼，其形制及营建过程还成为其他六阁的表率。文源阁、文津阁营建起始和竣工时间相近，乾隆四十年五月，乾隆皇帝撰御制诗《题文源阁》的写作时间亦早于《题文津阁》^①，但仍然明确表示出文津阁营建的示范作用。如乾隆四十一年撰御制诗《文津阁》即有“渊源如欲问，应自此寻津”，自注称：“仿浙江范氏天一阁规制，初于山庄建阁，以文津名之，御园之文源，大内之文渊，则皆由此津逮也”^②。而以文津阁、月台、趣亭组合而成的建筑群形式也在其他诸阁的营建中得到重现。四十一年正月，乾隆题咏圆明园文源阁附属之月台：“天一取阁式，文津实先构。月台及西山，米帖符邂逅。此即肖文津，诡石堆奇岫。亦复有月台，只欠西山靚”，并注云：“命仿浙江范氏天一阁之制，先于避暑山庄构文津阁，次乃构文源阁于此，月台则又仿文津而为之也。”^③四十九年，乾隆南巡至杭州，题咏文澜阁附属之趣亭：“文源取式逮文津，亦有趣亭栖碧岫。寄语将来钞读者，文澜不外史经循”，注云：“御园之文源阁继山庄之文津阁而建，其南屏以假山，俱有趣亭、月台，文津阁咏月台有‘米家范氏两兼奇’之句，兹文澜阁亦仿其式为之”^④，均可见文津阁营建的先行实践性质和示范作用。

二、“楠架形将插以盈”：文津阁藏书入度过程

文津阁的营建旨在度藏《四库全书》，但乾隆四十年夏文津阁全面竣工时，《四库全书》的修纂工作仍需时日，为避免书阁空置，乾隆皇帝下旨将《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先行陈设，并于此年七月底八月初间送往文津阁^⑤。据其御制诗自注：“我皇祖《古今图书集成》凡一万卷，虽无《永乐大典》之多，而考核精当，不似彼限韵割裂。因于文渊、文源、文津三阁各贮一部，以旧有之书已度之厨矣”^⑥，则文渊、文源二阁也同时计划陈设《古今图书集成》，此后又进一步成为四库七阁存藏之通例。乾隆四十一年夏，例行巡幸避暑山庄的乾隆皇帝看到文津阁中已缥缈盈室，为之题诗“葳事虽犹待，集成斯已珍”，并称：“建阁为贮《四库全

^①《御制诗》诸集的编纂以作诗时间为序。乾隆四十年所作《题文源阁》前一首诗《喜雨》作于五月望日，夏至日后启辟赴避暑山庄，而《题文津阁》《趣亭》《月台》之后一首诗《阵雨》作于六月初四，故此年所作《题文源阁》《题文津阁》均作于五月中下旬。一般来说，乾隆皇帝会在每年元月前往圆明园并题写吟咏文源阁的诗作，此年于五月撰写此诗，当特为其落成而作。

^②爱新觉罗·弘历撰：《文津阁》，《御制诗四集》卷三十八，《清代诗文集汇编》，第三二五册，第434—435页。

^③爱新觉罗·弘历撰：《月台》，《御制诗四集》卷三十三，《清代诗文集汇编》，第三二五册，第342页。

^④爱新觉罗·弘历撰：《趣亭》，《御制诗五集》卷六，《清代诗文集汇编》，第三二七册，第298页。

^⑤《金大人奏为热河文津阁陈设古今图书集成装潢事》，乾隆四十年五月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5—0319—067。转引自据小飞：《文津阁的肇建与修缮——兼论〈四库全书〉的度藏与移置》，《文博》，2017年第3期，第74页。

^⑥爱新觉罗·弘历撰：《题文源阁》，《御制诗四集》卷三十三，《清代诗文集汇编》，第三二五册，第342页。

书》之用，然钞录尚需数年，阁中空旷，用仿四库书函之式装潢《古今图书集成》，全部度架排列，亦颇可观”^①，足见其身处琳琅环绕中的欣慰之情。

此后，随着《四库全书》编纂工作的推进，不少书籍为供御览亦在此期间进呈至避暑山庄，文津阁或也曾作为这些书籍的暂时放置之所。乾隆四十七年三月三日，乾隆皇帝前往有“京东第一山”之称的盘山，驻蹕敬寄山庄，并下旨：“此次巡幸盘山，随报进呈之四库书，每报呈进一百五十本。将来巡幸热河，每报呈进二百本”^②，其意在将缮竣的《四库全书》恭呈御览。至四月，乾隆皇帝再次下旨：“所有此次热河呈进四库全书，着于七月天气晴霁时，即陆续发回，不必俟至八月”^③，这些呈进热河之书或即暂存于文津阁内，又由热河运回京城。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二月，计划藏于文渊阁的第一部《四库全书》已缮写完毕^④，随后赶缮将送往盛京文溯阁贮藏的第二部《四库全书》，至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缮写完毕^⑤，则此时进呈热河之书，或即属此第一、第二部。此外，乾隆四十七年九月，永璇等人上奏《四库全书》运送文溯阁事宜时谈及装载方式亦提及呈进热河之书：“查此项书籍俱经裁切打磨出细，并装有绢面，与现在恭送热河草钉之本可以用车装载者不同，必得按例抬运，方为慎重。”^⑥再如，乾隆四十九年五月，军机大臣复奏乾隆皇帝关于《四库全书提要》书末落款日期的询问称：“……查向来缮校各书，所写年分均系按照各呈进年分填写，从前进过一二三分书均保如此办理。惟月分有填写在前、进呈在后者，因无甚关碍，是以进呈时即用原填月分，以省挖补痕迹。现在运送热河备进各书所填月分，自二月至四月不等。理合据实覆奏。谨奏”^⑦，此时前三部《四库全书》均已缮毕入藏，所谓“运送热河备进各书”应即指正在缮写中的第四部《四库全书》。

由此看来，在《四库全书》缮写过程中，多有以“草钉之本”的形式将书籍先行发送至热河供驻蹕于此的乾隆皇帝御览，以便随缮、随审、随校，再发回北京整饬装潢后运送至各阁正式入庋。自乾隆四十年文津阁建成至乾隆五十年《四库全书》入庋前，这十年间，无论是《古今图书集成》的贮藏，还是进呈之书的暂存，文津阁都已发挥了藏书楼的作用。乾隆

^①爱新觉罗·弘历撰：《文津阁》，《御制诗四集》卷三十八，《清代诗文集汇编》，第三二五册，第434—435页。

^②《满票签为发报进呈全书之期另添马匹负迭事致典籍厅移付》，乾隆四十七年三月初四日，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1546页。

^③《谕所有此次热河呈进四库全书著于七月陆续发回》，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十七日，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1555—1556页。

^④《谕内阁全书第一分完竣所有总校等著总裁查明咨部照例议叙》，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初六日，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1446页。

^⑤《谕第二分全书校缮完竣总校王燕绪等著加恩授职》，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1689—1690页。

^⑥《多罗仪郡王永璇等奏运送盛京文溯阁陈设全书事宜请旨遵行摺》，乾隆四十七年九月十一日，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1638—1639页。

^⑦《军机大臣奏遵查发下〈四库全书提要〉填写年月缘由片》，乾隆四十九年五月初六日，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1774页。

皇帝每年巡幸至此，亦必至文津阁，题写下“木架香楠此空待”^①、“楠架行将插以盈”^②的诗句，饱含对《四库全书》入藏的热切盼望。

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缮毕的第一部《四库全书》至乾隆四十七年春全部入藏文渊阁。而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缮毕的第二部《四库全书》因需送盛京，路程较远，搬运分批进行，且为了提高效率，在缮写工作尚未全部完成时，即已筹划并开始搬运准备工作^③。乾隆四十七年九月，馆臣上奏拟于九月下旬开始运送《四库全书》及《古今图书集成》^④；十月初三，又奏请将第一批书籍运送的时间推迟至十月二十日，并于十一月十三日抵达盛京^⑤，第二批于十一月二十日起送，第三批于乾隆四十八年正月初五日起送，第四、五批照例亦于二月初五、三月初五起送，^⑥则四月前后应全部运送完毕。此年秋天，乾隆皇帝巡幸盛京，作《题文溯阁》^⑦，是其唯一一首题咏文溯阁的御制诗。

自首部《四库全书》缮竣后，第二、三、四部《四库全书》的缮写工作均耗费大约一年时间。乾隆四十八年冬，第三部《四库全书》缮写完毕，并于乾隆四十九年春入藏文源阁，或因无需长途搬运而未能留下更多档案以见其运送细节。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第四部《四库全书》缮写完毕^⑧，其运送文津阁的过程则与文溯阁类似。乾隆五十年三月二十日，第一批《四库全书》起送热河，共分四批，每批间隔十日，第二批于四月一日起送，第三批于四月十日起送，第四批于四月二十日起送，并于四月二十五日运至热河。^⑨

^①爱新觉罗·弘历撰：《题文津阁》，《御制诗四集》卷八十三，《清代诗文集汇编》，第三二六册，第389页。

^②爱新觉罗·弘历撰：《题文津阁》，《御制诗四集》卷九十一，《清代诗文集汇编》，第三二六册，第507页。

^③据清宫档案有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多罗质郡王永琿奏第二分应缮全书缮校全竣折》、《谕第二分全书校缮完竣总校王燕绪等著加恩授职》（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1688—1689、1689—1690页），一般认为第二部《四库全书》缮毕时间应以此为准，今从此说。但据小飞认为，馆臣在乾隆四十七年九月初次上奏文溯阁藏书运送方案时即已明确书籍函数，故《四库全书》缮毕时间应该在此年九、十月间，早于第一批书籍运送的时间，亦备一说。（据小飞：《文溯阁〈四库全书〉的撤改与补函——以相关档案为中心的考察》，《文献》，2020年第2期，第46—47页）

^④《多罗仪郡王永璇等奏运途盛京文溯阁陈设全书事宜请旨遵行折》，乾隆四十七年九月十一日，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1638—1639页。

^⑤《盛京兵部侍郎伯兴奏第一拨全书运到盛京折》，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1685页。

^⑥《军机大臣奏文溯阁收贮全书分拨起运日期并行知直奉督尹预为妥办片》，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初三日，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1642—1643页。

^⑦爱新觉罗·弘历撰：《题文溯阁》，《御制诗四集》卷一百，《清代诗文集汇编》，第三二六册，第658页。

^⑧《谕内阁全书四分告竣所有总裁总阅总纂等交部从优议叙》，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1822页。

^⑨《直隶总督刘戡奏奉旨送往文津阁全书已全数运至热河折》，乾隆五十年五月初八日，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文溯阁书籍运送自第一批至第五批持续近半年，一般每批间隔一月，而文津阁书籍全部运送仅花费一月余，每批间隔十日。二者之差异的存在，一方面是因为送往文溯阁的书籍在一部《四库全书》之外还有一部《古今图书集成》，且距离更远，正值冬季，天气、环境条件也更为严苛。另一方面，或因文溯阁书籍运送工作与第三部《四库全书》缮写工作在时间上仍有重叠，需要更多时间协调各方，而文津阁书籍运送开始时，距离第四部《四库全书》缮竣已有四月，准备时间相当充分，且又有文溯阁书籍运送的先例提供经验，故而能够顺利赶在乾隆五十年夏乾隆皇帝至避暑山庄之前全部入藏文津阁。

文津阁早在乾隆四十年即已率先建成，但它却是北四阁中最后完成《四库全书》入度的藏书楼，虽然期间亦作为书籍收藏、暂存地发挥作用，但单就贮藏《四库全书》这一营建目的而言，文津阁可以说是“楠架空待”时间最长的一阁。文津阁《四库全书》入藏标志着北四阁《四库全书》贮藏全部完工，十年之间，“自渊而溯复至源，兹乃于津睹厥萃”，也令乾隆皇帝感慨：“兹事体大物博，甫越十年，次第观成，用臻美备，实慰夙怀也”。^①

三、“核误考讹兹逮臻”：文津阁藏《四库全书》的复校

《四库全书》卷帙繁多，收录书籍三千四百余部，计六千多函，三万六千余册，编纂工作历时既久，规模浩大，所涉人员极多，虽然在编纂过程中设立了非常详细、周密的工作流程以尽可能确保其质量，但仍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问题。因此，《四库全书》的核查审校工作与编纂工作几乎是同时进行，如前文提及送往热河的“草钉之本”即供预先进呈乾隆皇帝之用，乾隆四十九年八月、十一月，军机大臣还分别根据四十九年夏季、秋季进呈第四部《四库全书》中错误之处奏报四库馆记过各员交部察议^②。而在入藏各阁之后也经历了多次核对、补充、删削、撤改等复校工作，如乾隆五十一年二月，即曾下旨将改正衔名各书、补空书籍等派员运送至文溯阁、文津阁，并于三月分别送达办妥^③，而涉及范围较广、参校人员较多的复校有乾隆五十二至五十五年及乾隆五十六至五十七年两次^④。

（一）第一次全面复校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1878—1879页。

^①爱新觉罗·弘历撰：《文津阁作歌》，《御制诗五集》卷十七，《清代诗文集汇编》，第三二七册，第482页。

^②《军机大臣和珅等奏查核四库馆暨三通馆错误记过各员交部察议片》，乾隆四十九年八月十四日；《军机大臣奏秋季所进第四分全书错误记过次数请将总校等官交部议处片》，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1792—1794、1811—1813页。

^③《直隶总督刘戡奏委员运迭补空书籍已交奉天热河折》，乾隆五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1933页。

^④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第七章“《四库全书》的撤改与复校”将《四库全书》复校工作概括为北四阁始于乾隆五十二年的初次复校、始于乾隆五十六年的再次复校以及南三阁的复校，并对各阁历次复校工作的详细过程进行了充分讨论，本文不再赘述，仅就文津阁藏《四库全书》相关的复校细节略作梳理、补充。

（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

《四库全书》第一次全面复校始于乾隆五十二年，即入藏北四阁后不久。此年五月，驻辟避暑山庄的乾隆皇帝在翻阅文津阁藏《四库全书》时发现书中讹谬甚多，十分不满，当即命扈从人员对其进行核查。因随行热河的皇子、大臣人手不足，且事发突然，并无缮写所需匠役、用料的准备，故五月十九日当日，军机大臣和珅等人专函武英殿总裁请求支援：“现奉旨将文津阁所贮四库全书详加校勘，所有应行挖补讹字及改换篇页之处甚多，卷页浩繁，此间匠役不敷，祈大人遴派武英殿妥熟匠役四名、供事一名，速来热河，以备应行挖补换页等事，并委该管库掌一员，带领前来。所有应用换页红格纸，亦酌量令其备带，听候备用。”^①五月十九日同日，又下旨令在京官员同时对文源阁藏本、文溯阁藏本进行校勘，发动尚书、侍郎、京堂以及翰、詹科、道、部属等官员二百余人，规定每日任务量，确定重校工作的地点、时间以及负责专业书籍校阅、书籍收发、挖改换页等的专职人员，有严重讹误的书籍要随报进呈并对原办人员进行责罚，力争两月内全部复校完毕。^②可见，因乾隆皇帝相当重视此事，复校得以马上进行，大量官员的参与也保证了复校工作的效率，而一些言涉违碍的书籍的发现，如引李清、钱谦益诸说的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等，更是加剧了事态严重性，故各方均迅速响应。

至此年六、七月间，随着文渊、文源、文津三阁复校工作的开展，一方面，乾隆皇帝及重要官员身处热河，而大部分重校工作则集中在京城，两地之间的公函、书籍、资料往来频繁，如双方就存档标记、复校工作署名方式等工作细节进行沟通：“所有现在覆校四库书，如有错误应行挖补者，俱着用糨糊黏实，免致日久脱落”^③，“此间因书多人少，随办随交，且原书既有总校、分校各衔名，现在校书之人自不能开列在前。若衔大者开列在后，又似于体制未协，是以所校各书，只存档册，不列衔名，即交进安设，倘遇将来议处，亦可按籍而求。至京中所办应如何黏签列名之处，围上势难画一，惟候阿哥、中堂斟酌办理示覆，再行酌办可也。”^④

另一方面，盛京文溯阁及南三阁的复校亦提上日程。乾隆皇帝下旨令原任总纂陆锡熊于福建学政任满后带领校书人员前往盛京，故实际复校工作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三月至七月进行，是七阁中最迟校毕的。南三阁的情况又与之不同。乾隆五十二年复校开始时，南三阁诸书已陆续发出，七月，经江南道监察御史瞻菴奏报：

查三分书一万八千册，闻已发交江南六千余册，余尚收贮武英殿，其校对蔡本俊等二十余人，亦现俱在京。且现在详校官二百余员，所阅书籍签改册档，经彭元瑞、纪昀看定者颇

^①《军机大臣和珅等为校勘文津阁全书匠役不敷事致武英殿总裁函》，乾隆五十二年五月十九日，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006—2007页。

^②《寄谕六阿哥永瑤等文渊文源所贮全书著派科甲出身尚书等校阅》，乾隆五十二年五月十九日，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004—2006页。关于此次文渊、文溯二阁复校情况，参见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第200—203页。

^③《军机大臣和珅等为奉旨覆校四库全书有关事致全书馆总裁函》，乾隆五十二年五月三十日，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017页。

^④《军机大臣和珅等为承询校勘衔名款式事覆阿哥等函》，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初三日，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020页。

为详慎，若就此对勘，既有据依，又易画一，而事属就便办理，并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俟文渊阁校改完竣，即饬令该校对等在武英殿重将三分书悉心覆校。……每分勒限两月办完。其已发出之数千册，即饬该馆于竣事后，将签改册档寄交陆费墀，责令一律查改。^①

乾隆下旨从其所奏^②。至七月二十日，经总纂永瑑等人查清，南三阁诸书“内一分未经发南，除空函外计书三万五千三百五十册；其二分节经浙江巡抚、两淮盐政各请发往书二千册，未发现存书每分三万三千三百五十册，总计三分共十万二千五十册。臣等现已查清，俱在武英殿存贮”，并正式确定参与复校的人员、办公地点、工作方案及进度^③，最终于乾隆五十五年全部校毕发出。

就《四库全书》第一次全面复校工作而言，虽然文渊、文源、文津三阁同时开始复校，但热河随行人员较少^④，且客观工作条件有限，故文津阁藏书的复校工作在秋季随蹕返京之前仅完成了三分之一^⑤。因四库底本此时贮藏于翰林院，而纂修所用各类文献也均留存京师各处，复校文渊、文源两阁尚有地利之便，文津阁《四库全书》孤置热河，缺乏参照，书籍册档等资料不足，工作效率也大打折扣。在复校开始时发现底本遗失及撤换导致的讹误^⑥，有鉴于此，乾隆皇帝下旨“将文渊、文源两阁书籍逐一核对，卷秩书目是否相符，按册详查，据实具奏，勿得稍存回护。俟查明后，再将文渊、文源两阁书目总册寄至热河，以凭稽查画一，俾无鲁鱼亥豕之讹。”^⑦当时，身为四库总纂的纪昀深感难辞其咎，考虑到违碍言论较容

^①《江南道监祭御史莫瞻菴奏请于武英殿重校三分书籍折》，乾隆五十二年七月初六日，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038—2039页。

^②《谕内阁著照御史莫瞻菴所奏于武英殿覆校三分书》，乾隆五十二年七月初八日，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040—2042页。

^③《质郡王永瑑等奏续办详校三分全书酌拟章程情形折》，乾隆五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050—2052页。

^④乾隆五十二年七月初四日《军机大臣奏开列拟赏文津阁校书人员纱疋数目进呈片（附清单）》：“查现在热河详校文津阁书籍人员，除太医院官已蒙恩赏外，谨将各员开写名单，并拟赏纱疋数目进呈。谨奏。附清单：和珅，王杰，福长安，董诰，阮葵生，阿肃，胡高望，嵩贵，吉梦熊，司鸿溥。以上各拟赏纱一疋、葛布一疋。收发记档官三员：检讨五泰，中书邱桂山、王中地。库掌伊昌阿，副库掌玉广，笔帖式永清。以上拟各赏纱一疋。”（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037页）据此可知当时在热河参与复校文津阁藏书的扈从人员情况。

^⑤乾隆五十三年五月有御制诗《题文津阁》自注云：“去秋驻蹕山庄，偶阅文津阁之书，初不意其讹舛，至于累牍联编，因命诸皇子及扈从诸臣计日校阅，得三分之一”。（爱新觉罗·弘历撰：《题文津阁》，《御制诗五集》卷四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三二八册，第173页）

^⑥《质郡王永瑑等奏查出遗失四库全书有印底本缘由折》，乾隆五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谕添派惠龄严行查办四库全书遗失底本及书目卷帙》，乾隆五十二年七月初一日；《质郡王永瑑等奏查明四库全书遗失有印底本请将提调等分别议处折》，乾隆五十二年七月三十日，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033—2034、2053—2056页。

^⑦《谕内阁将文渊等三阁书籍应换写篇页及工价令纪昀陆锡熊分赔》，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十二日，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027页。

易出现的明季、国初之书中，主动承担文源阁明神宗以后诸书的重校，奏请于文渊、文源两阁集中复校所限两月期满后至圆明园将文源阁藏明季、国初史部、子部、集部应勘之书再行勘办，精心细审以使违碍全除。^①此后，军机处奉旨致函纪昀称：“本日奉旨：所有本纪昀奏请自行认勘之明季国初史部、集部、子部及小说、杂记等书，现贮热河之文津阁者，亦着陆续寄京，一并发交纪昀一体校勘。钦此。希大人即将应勘文渊、文源二阁此等书目，详悉开一清单寄来，以便接单陆续送京覆勘。”^②可见，两地之间的书籍运送对文津阁藏《四库全书》的复校工作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人员不足、分隔两地的不便，均使得文津阁复校不及文渊、文源顺利。故而乾隆五十二年秋、乾隆五十三年秋，总纂纪昀分别带领校对人员前往热河，专门对文津阁藏《四库全书》进行复核、审校。这两次专赴热河的复校工作，持续时间长，目标集中，任务明确，故而比之前的大规模全面复校更为精慎细致，不仅发现了许多尚待修改的新问题，同时也为其他诸阁的进一步校改提供了经验。

乾隆五十二年九月十五日，和珅传旨热河总管全德等人负责迎接前来校勘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官员，并准备场地、桌凳、茶炭等^③。十月十五日，纪昀抵达热河，二十二日，与先行到达的九人正式开始复校工作。^④此次赴热河参与复校的人员初步拟定有：王燕绪、何思钧、仓圣脉、潘有为、杨懋珩、徐以坤、郭在逵、庄通敏、刘源溥、周琮、常循、程嘉谟、李巖、倪廷梅、吴锡麒、秦瀛、温常绶、励守谦、朱钤、孙球、卜维吉、石鸿燾、牛稔文、温汝适、许兆椿、王坦修、陈木、吕云栋、孙溶、祁韵士、德生、裴谦、王学海、莫瞻菴^⑤，计三十四人。其中，何思钧因病未愈、徐以坤因年迈无法前来，由子侄代替，另有二人留京查询底本，至十一月二十一日仍有朱钤、吕云棟、石鸿燾、陈木四人未到，最终参校人员为二十八人。^⑥

^①《礼部尚书纪昀奏沥陈愧悔并恳恩准重校赔缮文源阁明神宗后诸书折》，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十一日，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023—2025页。

^②《军机大臣为奉旨一体校勘文津阁诸书事致纪昀函》，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十二日，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027—2028页。

^③《热河总管全德等奏覆校书籍人员已到热河并收发办理缘由折》，乾隆五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082—2083页。

^④《礼部尚书纪昀奏请将文渊阁繙译册档移送热河一分等事折》，乾隆五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081—2082页。

^⑤《军机大臣和珅等奏遵旨将罚校看书及外任各员分别议罚片（附清单一）》，乾隆五十二年十月十八日，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074—2076页。

^⑥《礼部尚书纪昀奏报何思钧因病徐以坤因年迈未到热河复校文津阁书籍请予议处折》，乾隆五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承德市文物局合编：《清宫热河档案》，第六册，第76—77页。《礼部尚书纪昀奏参朱钤等四员尚未到热河校书折》，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谕内阁著吏部查明朱钤等四员因何未到热河看书分别从重议处》，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094—2095页。

虽然此次赶赴热河专为校勘《四库全书》，但事先准备仍有不足。十月二十四日，复校工作刚开始，纪昀即上奏称：“惟是文渊、文源二阁校正册籍，俱为刘墉、彭元瑞留为校理三分全书之用，其订正译语册档，亦未付臣。所有辽、金、元人地名，俱无从查改。应奏明请旨敕下刘墉、彭元瑞，将二阁繙译册档，以一分留京备用，以一分移送热河照改，庶两无贻误”，并请求设专员两名，在翰林院负责查询底本并信函往来传递所需信息，以解决校本与底本分隔两地的问题。^①至十二月十一日，在诸员的努力之下，修补完整归架者已二千四百余函，同时也发现了新的问题：

……伏查钦定四库全书，虽以经史子集为大纲，实分为四十四类，中又分六十二子目，皆区别甚明，原应于提要前二行下逐类注写，以清条理。因缮本系陆续进呈，总目尚未排定，未及注明，迨合架之时，又未照总目补注，遂至总目分类书不分类，未免界限混淆。现在文津阁书子部内杂家、类书二门颠倒互攙者，已经查出九部二十一函，是即门类未分之所致，似应逐部添写，方为清楚。^②

因事关全书体例，慎重起见，纪昀拟填写款式一并上奏，且请于回京后将文渊、文源二阁书俱照例填写，乾隆皇帝准其奏。^③

乾隆五十三年正月二十六日，所有应校书籍五千八百九十二函全部勘竣且修整归架，但仍有尚未解决的问题：

《西域图志》一册，空白回部字六页，无人能写，《春秋辨义》一册，底本下截破烂，无可查填……遗失《永乐大典》书三部，伪本抵换者一部，漏写遗书八部，缮写未全者三部，伪本抵换者四部，排架颠倒书四十六部，匣面错刻、漏刻及书签误写者共三十部，谨分款开列清单，恭呈御览。查遗漏抵换诸书，虽卷数稍多，幸书册多有衬纸，书匣亦原有高低，或撤去衬纸，或将匣帮略增分寸，尚可匀入。应请旨交武英殿、翰林院二处查寻底本，容臣回京赔写。其应换刻匣面，头绪烦多，恐隔手必有舛错，仰恳圣恩，准臣于赔写书完后仍前来热河，携带工料亲自监督抽改，方不再误……将各匣应换应移及应赔带环之类，先一一于匣面黏贴黄签，并详开数目字样，造册交热河总管董椿等，以便将来照数领换。^④

^①《礼部尚书纪昀奏请将文渊阁繙译册档移送热河一分等事折》，乾隆五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081—2082页。

^②《礼部尚书纪昀奏敬拟添写总目款式进呈御览等事折》，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107—2108页。

^③《礼部尚书纪昀奏敬拟添写总目款式进呈御览等事折》，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108—2109页。

^④《礼部尚书纪昀奏来热勘书完竣并查明阙失颠舛各书设法办理折》，乾隆五十三年正月二十七日，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114—2115页。

此年二月初十日,纪昀起程回京^①,二月十五日,军机大臣对相关情况进行了核实并奏报乾隆皇帝^②,此次复校暂告一段落。

乾隆五十三年十月十八日纪昀再次从北京启程,至二十二日抵达热河,按照年初的计划继续解决遗留问题,由时任热河总管的董椿等人负责按册检运、收发书籍,武英殿库掌依常阿带领匠役、材料至热河,负责改刻匣盖、修做匣口、面页、环带、夹板等。^③在改换腾挪书匣、逐架校对过程中,纪昀发现装匣排架的重大问题:

……缘陆费墀排架之时,凡系巨帙,俱挨次装匣,凡系零帙,则不论朝代,不论门类,俱以数种合为一匣,以省配搭之烦,遂致纷纷错乱。今于排架既定之后,逐种抽出,归还原次,须通盘合算,一一设法插补,方能与流号数目相符,臣现在将错乱之书,先行按次排定,然后比量尺寸,照原匣数目另自搭配。^④

此项工作涉及书籍排序、装匣组合调整、书匣匣面重制、架图目录抽改等,十分繁复,遂成为此年十月至十一月复校工作的重点^⑤。此外,当年制作书匣时曾预备空函,此次尚不足用,故需酌情补制,同时调整装匣方式以节省新制成本:“臣窃思编辑之时,虽采掇群言,全收精粹,亦间有意求赅备,以稍次之书节取备考者。如择次等之书,量撤数部为插入空匣之地,则全书去取益精,亦可省多行拆动,似乎两得。”^⑥此法在文渊、文源及南三阁藏书装函排架调整中得到了应用。^⑦十一月下旬,因“现在办理文渊阁书匣,必须俟此间酌定章程

^①《热河总管董椿等奏文津阁所贮全书已校竣归架等情折(附清单一)》《热河总管董椿等奏纪昀又拣出应燬书七部并重复书一册片》,乾隆五十三年二月初十日,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116—2118页。

^②《军机大臣阿桂等奏遵议纪昀查勘热河书籍分别办理折》,乾隆五十三年二月十五日,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119—2120页。此年夏乾隆皇帝照例驻蹕避暑山庄,抵达后不久即令军机大臣前往文津阁再次详查书籍状况,并重申纪昀应于十月前来对书匣、书名、内容讹误及书籍装潢污损等情况进行妥善处理。(《军机大臣奏遵旨至文津阁查看书籍情形片》,乾隆五十三年五月三十日,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125—2126页)

^③《热河总管董椿奏纪昀来热河时间及办理书籍情形折》,乾隆五十三年十月三十日,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145—2146页。

^④《礼部尚书纪昀奏恭报办理文津阁书匣等情形折》,乾隆五十三年十月三十日,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147页。

^⑤《礼部尚书纪昀奏恭报办理文津阁书匣等情形折》,乾隆五十三年十月三十日,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146—2148页。

^⑥《礼部尚书纪昀奏请修改文津阁书函折》《礼部尚书纪昀奏撤去次等之书以为插入空匣之地片》,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149—2150页。

^⑦《谕文源文津两阁书籍著交纪昀照此办理》,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156页。《寄谕浙江巡抚琅玕将纪昀原折发给陆费墀阅看明白登答》,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初五日,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148—2149页。

后寄至热河，再将文津阁书匣画一办理，方不致彼此两歧，”^①故纪昀等人同匠役一起奉旨回京。

（二）第二次全面复校

《四库全书》第二次全面复校始于乾隆五十六年，巧合的是，此次复校工作与第一次全面复校一样，缘起于乾隆皇帝驻蹕避暑山庄期间翻阅文津阁藏《四库全书》，发现《仪礼经传通解》^②《扬子法言》等书仍存在脱漏错谬之处，特别是《扬子法言》，卷端即有空白二行漏写，极为明显，令乾隆皇帝十分不满：“纪昀及详校官庄通敏，俱着交部分别议处。除将文津阁四库全书内《扬子法言》一书，就近交军机大臣将空行填补，并缮录御制文于篇首外，着纪昀亲赴文渊、文源二阁，将《扬子法言》一书检出，缮录御制文冠于简端，并带同详校各官，抽查此书卷首是否亦有空白之处，及此外各书有似此脱误者，一体抽阅填改。如再不悉心详检，经朕看出，必将纪昀等加倍治罪，不能再邀宽贷也”^③。军机大臣在填补《扬子法言》空行时又发现了书中更多讹写之处，故下旨对纪昀、庄通敏再行议处。^④随后，纪昀先赴文源阁进行复校，至九月底复校完毕，这次复校又发现了不少捏造、原阙、空白、墨涂之处及空函情况。^⑤至乾隆五十六年底，文渊阁全书亦复校完毕。

第二次全面复校的参校人员安排亦同第一次全面复校时，采取将功补过之法：“现在留空函书俱需详校，应如所奏，令纪昀查明，讹舛较少者罚令看文源阁留空函，其讹舛较多、过失较重者，罚令前往热河看文津阁留空函书。”^⑥过失较重者罚往热河，或因避暑山庄校书的客观条件比京师更为艰苦之故，也正因如此，文津阁部分书籍仍需发还京师进行修正：“其热河一分，内除挖改换页业经纪昀自请就近办理外，如有成部成卷驳换者，亦一并令纪昀带回，交武英殿提调及校对各员赔写。”^⑦

^①《军机大臣为奉旨办理文渊阁书匣章程事致纪昀函》，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151—2152页。

^②《军机大臣奏将文津阁全书内查出〈仪礼经传通解〉黏签进呈片》，乾隆五十六年七月初六日，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232页。

^③《谕内阁将文津阁全书内〈扬子法言〉空行交军机大臣填补等事》，乾隆五十六年七月十八日，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232—2233页。

^④《军机大臣等奏遵将〈扬子法言〉讹写之处夹签进呈片》《军机大臣奏遵旨拟写将纪昀等再行议处谕旨进呈片》《谕内阁〈扬子法言〉一书缮写讹错纪昀等著再行交部议处》，乾隆五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谕纪昀著免其革任仍注册庄通敏著于补官日降二级调用》，乾隆五十六年八月初六日，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234—2235页。

^⑤《左都御史纪昀奏文源阁书覆勘先完请将详校官等分别议处折》，乾隆五十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军机大臣阿桂等奏酌议纪昀请将文源阁详校官等分别议处情形折》《军机大臣阿桂等奏酌议纪昀请筹办新添空函诸书情形折》，乾隆五十六年十月初十日，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237—2245页。

^⑥《军机大臣阿桂等奏酌议纪昀请将文源阁详校官等分别议处情形折》，乾隆五十六年十月初十日，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240—2241页。

^⑦《军机大臣阿桂等奏酌议纪昀请筹办新添空函诸书情形折》，乾隆五十六年十月初十日，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244页。

乾隆五十七年三月二十一日纪昀自京起程，三月二十五日至热河，此次参校人员共计二十一人，仍由热河总管负责接应人员、书籍收发、预备桌张茶水、阁内环境维护等事务。^①文津阁中有已经详校书五千八百八十函及未经群校的空函新书二百六十四函，复校采取文渊、文源二阁“廊下校阅”的方式：“即在本处廊下办理，以免扛抬出入，磕损书匣，且挨架取阅，随看随修，随即归架，亦免颠倒错乱，再费周章。”^②至四月十日，经部校毕，“已签出空白舛误一千余条，分别修补。其未办各书，约计签数每部当亦相仿，似乎从前各员漏签之处，大致可以廓清”^③。然而，如此多的讹误实令乾隆皇帝更觉震怒，四月十五日，寄谕纪昀称：“上年既经朕看出，此次复又有签出空白、舛误一千余条之多，可见校勘一事，全属有名无实……纪昀着传旨申饬，并合将覆校各书务臻完善，毋得再有舛误，致干咎戾。若朕驻跸热河时，再经指出错误，必当重治其罪也！”^④

四月底，文津阁《四库全书》陆续校毕归架，错误较多、需撤出带回北京的书籍则有：“经部内《周礼注疏删翼》等书共三十册，史部内《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等书共六十二册，子部内《西清古鉴》等书共一百二十一册，集部内《范忠贞集》等书共一百十七册。”^⑤部分需要全部替换重缮的书籍，着令武英殿先行换写，议叙得官各供事名下摊赔，以《性理大全》一书为例，“此书十函五十六册，页页俱错，不能挖改板心，必须全部换写，以每册二三万字计算，写价已六、七两，加以纸价装潢，须八、九两方换一册，四、五十两方换一函。统计四阁四十函二百二十四册，约估需银二千两。”^⑥重新缮写装潢完毕的书籍则由纪昀带领官匠抽换文渊、文源二阁书，再赴文津阁归架办妥。此外，乾隆五十七年（1792）二月至闰四月，文溯阁的复校工作也同步完成^⑦。至此，《四库全书》第二次复校工作基本结束。

《四库全书》规模巨大，收录繁多，书籍种类、底本来源多样，官方修典的性质虽能保证纂修工作高效迅速地推进，却也因参与人员众多而难以维持稳定的质量，正如纪昀所感慨：

^①《热河总管福克精额等奏纪昀等覆勘书籍及收发办理缘由折》，乾隆五十七年四月初十日，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301页。

^②《热河总管福克精额等奏纪昀等覆勘书籍及收发办理缘由折》，乾隆五十七年四月初十日，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301页。

^③《左都御史纪昀奏前赴热河覆勘文津阁书籍情形折》，乾隆五十七年四月初十日，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299—2300页。

^④《寄谕左都御史纪昀传旨申饬令将覆校各书务臻完善毋再舛误》，乾隆五十七年四月十五日，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302—2303页。

^⑤《热河总管福克精额等奏文津阁书籍校竣已照式归架折》，乾隆五十七年闰四月二十七日，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304—2305页。

^⑥《户部为知照查议周兴岱等人事致典籍厅移会（附黏单一）》，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十八日，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310—2311页。

^⑦《盛京将军琳宁等奏重校文溯阁书籍人员事竣回京折》，乾隆五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303—2304页。

“各员在京看书患其各有私事，不免稽延，在外看书则恐其或有归心，不免草率”^①。故而虽然经过了两次全面复校，文津阁藏《四库全书》诸书内仍然时有零散问题被发现。如乾隆五十八年七月，乾隆皇帝驻蹕避暑山庄，阅文津阁藏书，发现《古烈女传》内“福祐”讹写“福祐”，负责校勘的官员因此罚俸。^②乾隆五十九年（1794），因文源阁《四库全书》内《盐铁论》末册缺少第六十《杂论》一篇，故交纪昀等补写装入，同时核对文渊阁、文津阁藏本。根据核查结果，虽然此二阁藏本并无末篇漏写的情况，但文津阁藏本却发现了另外的漏写：“惟查文津阁送到之本，每卷首页均漏写‘明张之象注’一行，其前五册有无漏写，应一体查明，责令原校、详校各员抽换赔写，仍交部照例议处，并将文津阁本一同夹签进呈。”最终查明文津阁藏《盐铁论》确因疏忽而遗漏此行，只得全部赔写，纪昀等人交部议处。^③乾隆六十年七月，因再次发现文津阁书之错讹，乾隆皇帝令军机处寄谕纪昀：

昨于几暇，取阅文津阁藏四库书内《垂光集》一册、《奏议》二册。其中“充”字讹写作“克”，“彼”字讹写作“波”。似此者尚不下十余处。前因四库书舛误之处较多，特命纪昀前来热河，覆加校阅，自应悉心讐校，俾臻完善。今偶加披阅，两、三册之中错讹已不一而足。纪昀所办何事？着传旨申飭。所有校出讹字，除交军机大臣就近改正外，并着另单抄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④

不过，虽然上谕言辞严厉，斥纪昀“所办何事”，但乾隆皇帝也深知校勘不易：“校书如扫落叶，今虽已复勘精详，犹未能信其竟无讹误也”，“保无鲁鱼潜犹伏，譬若尘埃扫又生”。^⑤实际上，不惟校勘，《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及入庋七阁后均还存在陆续删改、增补、撤换等等情况^⑥，部分工作甚至持续到嘉庆年间^⑦。自嘉庆以后的清代帝王因无夏天驻蹕避暑山庄

^①《礼部尚书纪昀奏敬拟添写总目款式进呈御览等事折》，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108页。

^②《[军机大臣]等为文津阁所贮古列女传内错字奉旨指出积算罚俸事启文》，乾隆五十八年七月十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承德市文物局合编：《清宫热河档案》，第七册，第275页。

^③《军机大臣奏文源阁全书内〈盐铁论〉缺写一篇请将纪昀等察议片》，乾隆五十九年三月初五日；《军机大臣奏呈纪昀等补写文源阁〈盐铁论〉缺篇并文津阁本漏写情形片》，乾隆五十九年五月初八日；《军机大臣奏遵旨将文津阁所缮〈盐铁论〉遗漏处询问纪昀情形片》，乾隆五十九年五月初十日，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366—2367页。

^④《寄谕礼部尚书纪昀原办文津阁书错讹不一而足》，乾隆六十年七月十四日，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373—2374页。

^⑤爱新觉罗·弘历撰：《题文源阁》，《御制诗五集》卷九四，《清代诗文集汇编》，第三二九册，第328页；爱新觉罗·弘历撰：《题文津阁》，《御制诗五集》卷九八，《清代诗文集汇编》，第三二九册，第390—391页。转引自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第221页。

^⑥比如各阁《四库全书》内仍存有部分空函待补，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将空函补入工作归纳为纂办、缮校两部分，具体如改纂增补、重改译音、临时新修等（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第243—255页）。

^⑦主要集中在嘉庆八年至嘉庆十一年间（1803—1806），以乾隆皇帝御制诗文集、钦定各书、乾隆六十年前告成之书为增补收录的范围。（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第255—261页）

的惯例，文津阁亦不复“阁景清宜目”^①的面貌，甚至逐渐出现年久失修、房屋坍塌的状况，为了保护其中所藏《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文津阁在清中后期又经历了数次规模或大或小的修缮工程，即时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也尽可能维持其基本的藏书条件，其中，同治五年十一月至次年十一月（1866—1867）、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至光绪二十七年正月（1899—1901），文津阁藏《四库全书》曾分别暂移置于避暑山庄内临芳墅殿、万壑松风殿，为确保在文津阁修缮期间妥善保护书籍^②。

文津阁是四库七阁中率先落成的一阁，但文津阁所藏《四库全书》却是北四阁中最后缮成入庋的一部，与藏于文渊阁的第一部、藏于文源阁的第二部相比，缮写稍显仓促，但在两次全面复校中，文津阁藏《四库全书》均得到了极大的重视，经过了数次有针对性的集中复校，书籍质量有所改善，也带来更为复杂的问题。《四库全书》的两次全面复校均缘起于文津阁藏《四库全书》，这或与文津阁及其藏书处于避暑山庄内而得到乾隆皇帝更多翻阅检视有关，因此，不仅文津阁的营建可称诸阁表率，文津阁藏《四库全书》的校勘补缮也为其他诸阁藏书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经验与教训，而远处热河的地理位置、作为行宫的人员配置等客观条件又使得文津阁藏书复校在协调参校人员、两地资料运转、书籍往返补缮及装潢制作等方面呈现出与其他诸阁有所不同的工作模式。如此种种历史细节，结合文津阁藏《四库全书》原书、原函、原架保存至今的独一无二的完整状态，将为《四库全书》研究相关话题的揭示提供更多线索。

^①爱新觉罗·弘历撰：《题文津阁》，《御制诗四集》卷九十八，《清代诗文集汇编》，第三二六册，第619页。

^②据小飞：《文津阁的肇建与修缮——兼论〈四库全书〉的庋藏与移置》，《文博》，2017年第3期，第74—77页。此文详述嘉庆至光绪五朝之中文津阁的历次修缮情况，可供参考。